

民工总数已超过1.3亿，解决这部分人的贫困问题，既关系到中国城市的良性发展，也是促进农村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开展“春风行动”，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在外务工前，在县乡免费得到政策咨询和就业信息服务；进城

后，在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得到免费职业介绍服务；求职期间，在所有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推荐的民办职业中介机构得到诚信服务。中国政府还编制了《农民工维权手册》，免费发放，帮助农民工掌握法律与政策，以有效维护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权益。（来源：摘自《中国人权网》）

〔责任编辑：梁颖〕

关于当代中国女性流动人口性别认同的研究

王明宣 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一、背景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劳动力需求剧增，人口流动政策逐渐放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抱着改善经济和生活条件的梦想流入城市打工。近三十年，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由1982年3000万激增到2005年的1.47亿。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女性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2001万，占流动人口总量（4242万人）的47.2%，大多数女性流动人口到工厂打工，因而派生出一个新的称谓——“打工妹”。目前由于女性流动人口的迅速发展，有关女性流动人口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婚姻、家庭和维权等成为研究的焦点。

本文主要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和访谈事例来定性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的性别认同。通过剖析这种认知的形成原因，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她们的低微阶层身份相比，中国女性流动人口对于她们自身存在着明显的负面性别认同。同时，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由此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导致她们在争取资源、机会和权利等方面

被忽视、被边缘化。因此，我们建议，改变女性流动人口自我性别认同至关重要，目的是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的地位和权利，最终实现性别平等。

二、女性流动人口性别认同的现状

身份认同是内嵌于社会关系中并被逐步建构出来的(Berger,1966)，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里个人的身份认知，代表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生活方式。它是社会化的产物，也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变化。与身份认同形成相关的三个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和“我要到哪里去？”（高景柱,2008）。因此，当前女性流动人口的性别认同就反映了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社会地位的变化。

在中文里“打工妹”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暗示了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年轻女性农民低微的社会地位和恶劣的生存条件。这意味着“一种深嵌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与性别关系之中的次等劳动身份认同”（潘毅，2005）。女性流动人口面临着待遇低下、服务和资源利用“去权”¹的困境，

¹ 指受外在因素影响，某些群体未能保护及运用一些他们有权享有的社会资源。

受到了来自社会、企业和家庭父权制的歧视和压迫,遭受着阶层、性别和地域差异等多层面的残酷剥削(李小江,1997)。“因为我是谁,所以我行动”(Somers,Gibson,1994),这一身份认同政治学中的著名法则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流动女性群体。由于对自身性别认同的负面认知,流动女性们即使遭受极端不平等的境遇,却仍选择不表达不申诉,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同时这一认同又强化了该群体在城市中的不平等待遇,从而使她们陷入了权益受损的恶性循环。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曾于2001年7月至2002年1月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一项关于“外来女工的权益保障和生存状况”的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039份。调查结果显示,24.3%的被访外来女工有着权益受损的遭遇,14%的人受过工伤。然而,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他们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此外,24.3%遭受权利侵害的人中,只有12.3%的人选择了采取行动进行抗争(比如求助于政府或诉诸法律手段),而87.7%的人则选择了保持沉默。在这87.7%的组别中,又有将近40.0%的受访者对于政府没有信心并认为即使采取行动也是无效的,另外26.3%则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抗争(中山大学社会学系,2003)。显然,这些数据为当前大多数流动女性对不平等遭遇保持沉默的现状提供了有理、有力的证据。

三、造成女性流动人口产生消极性别认同的原因

不可否认,女性流动人口对性别认同的消极认同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受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中国社会传统的性别歧视

从根本上说,女性流动人口的消极性别认同

源于中国社会传统的性别歧视观念。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男性优于女性的观念根深蒂固。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社会主张男女平等,但想在短短几十年内完全转变观念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性别歧视现象在各行业仍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仍然是家庭分工的主要方式,这在信息传播和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尤为明显。

如今,女性在就业、晋升和社会参与等方面依然受到歧视,属于二等公民。(高景柱,2008)而进城打工的女性也选择了默默忍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外来女工的权益保障和生存状况”调查结果显示,53.8%的受访者认同女性打工者比男性面临更多的困难,只有27.5%的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何艳玲,2003)

2. 户籍制度的影响

户籍制度在资源分配、城乡二元结构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女性流动人口产生消极性别认同的体制性基础。女性流动人口为城市建设贡献了她们的青春和力量,却得不到社会相应的回报。户籍制度造成的严格的居住限制,导致女性流动人口陷入了不被容于城市却又不甘心回到农村的尴尬境地,使得她们只能被动接受自己的消极身份。

3. 文化生产者的参与和推动

自农村进城务工女性以一个群体的形象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学界和大众媒体就开始参与了她们身份认同的构建。这些文化生产者运用文字、广播、影像等形式对这一群体用“女性农民工”或“打工妹”进行概化统一,并将其向社会大众进行宣传推广。他们本是想通过“女性农民工”、“打工妹”的表述来引起公众对于处于边缘化和劣势地

位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关注,但实际上却导致了负面效应,使之偏离了平等公正这一根本原则,因为这一称谓本身就预设了流动女性是比城市居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村男性更弱的人口存在。

4. 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低效发展

关注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在提高女性农民工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但目前中国妇女组织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性别价值观限制了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有效运作;二是缺少持续发展的资金;三是政府没有提供充分有力的支持;四是女性流动人口缺少推进民间妇女组织的觉悟和行动。

四、女性流动人口消极性别认同所造成的影响

诚然,到城市打工不仅改变了女性流动人口的生存空间,而且改变了她们的价值观念。但是她们不得不面对双重挑战:一是城乡之间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二是性别歧视,她们不得不忍受比男性农民工更为恶劣的待遇。

五、结论和建议

由于传统的性别歧视、户籍制度限制、文化者参与推动和妇女组织低效发展等方面原因,当代中国女性流动人口消极性别认同明显,处境窘迫。

为了增强女性流动人口的权益,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和完善她们的性别认同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建议如下:

1. 加强社会宣传,削弱性别歧视观念,促进社会的平等、公正;
2. 改革户籍制度,减少城乡壁垒;
3. 对学界和大众媒体进行正确引导并使其在提高流动女性群体权益上发挥重要作用;
4. 为妇女非政府组织提供制度上和财政上的

支持,以使之在协调女性流动人口与社会各阶层的冲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1. Margaret R. Somers & Gloria D. Gibson: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 by Craig J. Calhoun. U.K., USA: Blakwell: Oxford/Cambridge, 1994
2. Ngai Pun, Chris Smith: Putting Transnational Labour Process in its Place: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07, Vol.21, No.1: 27-46
3. Peter Berger: Identity as a Problem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6 (7)
4. 陈佩华. 生存的文化: 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人的生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5. 陈映芳. 农民工: 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社会学研究, 2005(3)
6. 高景柱. 转型时期中国女工的身份认同问题, 2008
7. 何艳玲. 对外来女工群体的价值观分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青年研究, 2003(10)
8. 李小江. 平等与发展, 三联书店, 1997
9. 孟宪范. 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0. 潘毅.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 杜克大学和香港大学出版社, 2005
11.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外来女工权益保障与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妇女研究论丛, 2003(12)
12.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 2003(4)

(张立红摘译)

[责任编辑: 梁颖]